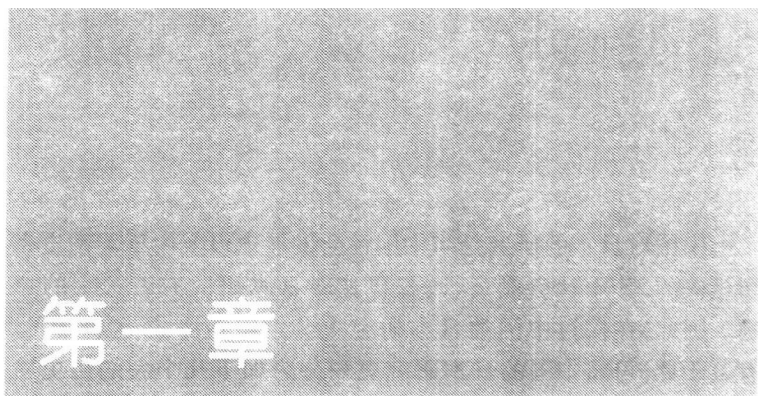


第一编



中国的日本研究：回顾与展望

李 玉

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是与中国社会发展史以及中日关系史密切相关的，其中社会制度、政权更迭对日本研究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在探讨中国的日本研究史分期时应考虑这些因素。有鉴于此，可将中国的日本研究史划分为如下几个大的历史阶段：(1) 明代以前；(2) 明代；(3) 清代；(4) 中华民国时期；(5)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现简要介绍如下。

一、明代以前的日本研究

中国最早记载日本的文献是古代地理书《山海经》。该书“海内北经”第十二云：“盖国在钜燕之南，倭北，倭属燕。”这里在介绍盖国时，提到了“倭，位于燕之南。此处的‘倭’是否指现在的日本难于判断。据说，《山海经》成书于战国、前汉。写于公元 1 世纪的《汉书·地理志》中写道：“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些是中国有关日本地理位置的最早记载。

公元 289 年（晋太康十年）陈寿 223—297 所著《三国志·东夷传》（《魏志·倭人传》）较为系统地记述了日本的情况。可以说，距今 1700 多年前，中国已开始研究日本。

从《魏志·倭人传》开始到明代，对日本的记载均见于官方的正史，各朝正史对周边邻国都立传记述，其中包括日本。这些官方正史如下页表所示（其中明史、新元史、清史稿为清代及民国时代所撰）。

其中较有价值的有《三国志》、《后汉书》、《宋书》、《隋书》和《宋史》。

明代以前，中国的日本研究的特点是：

1. 有关日本的记述均列入各朝的官书即正史之中，在形式

书名	作者	写作年代	志传名称	对日本的称呼	备注
三国志	陈寿	晋太康 10 年(289)	东夷传	倭人	
后汉书	范曄	宋元嘉 22 年(445)	东夷传	倭	
宋书	沈约	齐永明 6 年(488)	夷蛮列传	倭国	
南齐书	萧子显	梁天监 13 年(514)	东南夷传	倭国	
梁书	姚思廉等	唐贞观 9 年(635)	东夷传	倭	
隋书	魏徵等	唐贞观 10 年(636)	东夷传	倭国	
晋书	房玄龄等	唐贞观 20 年(646)	四夷列传	倭人	
南史	李延寿	唐显庆 4 年(659)	夷貊传	倭国	
北史	李延寿	唐显庆 4 年(659)	四夷传	倭	
旧唐书	刘 昫	后晋开运 2 年(945)	东夷传	倭国、日本	两称并用
新唐书	欧阳修等	宋嘉佑 6 年(1061)	东夷传	日本	
宋史	脱脱等	元至正 5 年(1345)	外国传	日本	
明史	张廷玉等	清乾隆 4 年(1739)	外国列传	日本	
新元史	柯劭忞	民国 9 年(1920)	外国传	日本	
清史稿	赵尔巽等	民国 16 年(1927)	邦交志	日本	

资料来源 武安隆、熊达云著《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日文版)日本六兴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 页。

上为外国传记,均称“倭国传”格式死板,篇幅有限。例如《魏志·倭人传》全文 1987 字,《宋书·倭国传》全文 565 字。

2. 内容上多为介绍和叙述的纪实性记载。

3. 方法上多为记录听闻或抄袭前史。例如,《后汉书》的大部分内容取自《魏志·倭人传》,只有个别之处作了修订和补充。

二、明代的日本研究

进入明代,中国的日本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是与当时明代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的。明代面临着“北虏南倭”,“北虏”指北方蒙古人的入侵,“南倭”指日本海盗集团即倭寇的骚扰。当时倭寇从日本列岛沿朝鲜半岛自北向南屡屡袭击明代商人和居民,破坏中国沿海海上运输和正常往来,成为一大祸害。此外,日本来自陆上的威胁也不容忽视。1592 年 3 月,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派 16 万军队入侵朝鲜,明朝派兵援朝。面对着日本来自海上与陆上的威胁,加强对日本的研究已刻不容缓,而明朝廷围绕对日政策的争论(焦点是对日贸易与海禁问题、对付倭寇的策略问题;援朝抗倭问题)又推动了日本研究的开展。

明代有关日本研究的成果颇丰,除官撰《元史·外夷传》外,记述日本的主要著作有《日本考略》、《筹海图编》、《日本风土记》(或《日本考》)、《图书编》、《皇明书》、《皇明象胥录》、《潜确居类书》、《国朝献征录》、《苍霞书》、《全边略记》、《博物典汇》、《名山藏》、《殊域周咨录》、《皇明驭倭录》、《倭变事略》、《靖海纪略》、《两朝平攘录》和《倭患考源》等许多种,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日本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明代的日本研究的特点是:

1. 在编撰制度上,除沿用以往的官撰制度,继续以撰写正史

研究日本外 还吸收了民间学者、官员、军人参与日本研究 扩大了参与编写人员的范围,只要学有专长,均可著书立说,独立发表研究成果,开辟了民间自主研究的新途径。

2.在形式上,突破了官撰正史的刻板格式,不少研究著述以专著形式出现。例如 薛俊撰写的《日本考略》共 3 卷(一说 4 卷)由沿革、境界、州郡、属国、山川、特产、户籍、世纪、制度、风俗、朝贡、贡物、边寇、文词、寄语、评议、防御等 17 部分组成,内容全面、详尽,可称得上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日本研究专著。还有郑若曾撰写的《筹海图编》全书 13 卷,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是研究如何防止倭寇入侵和进行抵抗的专著,该书第 2 卷“倭国事略”专门记述了倭寇的活动规律,并对日本天皇及中国皇帝的差异进行了评论。

3.不少著作,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例如《日本考略》中的“寄语略”为明代的日本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尝试,“寄语”意为将日语译成中文,“寄语略”为中日对译单词集。“寄语略”中共收集 350 多个日语单词,按天文、地理、人物、花草、衣物和饮食等,共分 15 类。郑舜功撰写的《日本一鉴》也开辟了许多新领域,如职员栏、人物栏、器用栏、鬼神栏等,这些内容是过去任何著作都未曾涉及的新领域。^①

4.明代的日本研究仍未完全摆脱以往的隔海研究日本以及抄袭前史的研究方式。但是,与以往的研究相比,不少人开始通过实地调查进行查核及对比研究。例如,《日本一鉴》的作者郑舜功于 1556 年亲赴日本考察,“咨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其说,得览其书”通过半年的直接调查和观察,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因此,其研究成果在内容的广泛性、史料的真实性等方面

^① 武安隆、熊达云:《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第 73 页。

都有了较明显的进步。例如，该书中记述的日本的 614 个郡名、町村数及官名都来源于日本典籍和文件，极具可信性。

三、清代的日本研究

清代的日本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现分述如下。

第一时期，从清朝立国（1644）至日本明治维新（1868）。这一时期日本正值“锁国时代”，在 1854 年日本“开港”，1858 年日本“开国”前，德川幕府对内严禁日本人出国，不许与外国人接触，对外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日本，只允许中国、荷兰和朝鲜人进入指定地区。中日尚无外交关系，少量的贸易也只限于长崎的“唐人馆”。而此时的清朝，国势隆盛，只把日本看作为一个“朝贡小国”。乾隆年间朝廷编撰的《大清统一志》列举了 30 多个朝贡国，日本列第 12 位。该书的“日本条”只有“建制沿革”、“风俗”、“土产”三项，内容均抄自旧史，无任何新资料。乾隆年间编撰的《皇清职贡图》一书将日本作为朝贡国对日本的介绍只有 139 个字，简单至极。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成果甚少，质量也不高。可以举出的有，陈伦炯的《海国见闻录》中的“东洋记”、汪鹏撰写的《袖海编》以及翁广平撰写的《吾妻镜补》（别名“日本国志”）。《吾妻镜补》成书于 1814 年（嘉庆十九年），有 30 卷本和 28 卷本两种。内容包括：世系表 10 卷，记述了天皇世系及中日关系史，此外有地理志（2 卷）、风土志（2 卷）、食货志（1 卷）、通商条规（1 卷）、职官志（1 卷）、艺文志（7 卷）、国书（1 卷）、兵事（1 卷）、附属国志·杂记（1 卷），该书内容广泛，资料翔实，是这一时期中国人研究锁国时代日本的一部代表作。

第二时期，从日本明治维新（1868）至中国辛亥革命、清朝灭亡（1911）。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积极学习西方，实行维新改革，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尤其是在 1894—1895 年的甲午海战中打败清军，引起中国朝野的极大震动。有识之士犹如大梦初醒，迫切地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特别是一些急进的改革派，更是积极倡导以日本为榜样，实行变法维新。在这种背景下，从明治维新到 20 世纪初，在中国掀起了研究日本、学习日本的高潮。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日本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其主要表现是：

1. 中国驻日使馆公职人员积极从事日本研究。中日两国通过 1871 年 9 月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877 年建立中国驻日公使馆，驻日使馆人员利用驻日的便利条件，广交朋友，多方收集材料，对日本进行研究，出了不少成果。如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以日记形式撰写了《使东述略》，以诗文形式写了《使东杂咏》首任副公使张斯桂撰写了《使东诗录》第二任公使黎庶昌写了不少访日游记、杂记，后编入其文集《拙尊园丛稿》。此外 黄遵宪 参赞 撰写了《日本杂诗》、《日本国志》 杨守敬 参赞 写了《日本访书志》 姚文枬 随员 编纂了《日本志稿》和《日本地理兵要》，陈家麟（随员）撰写了《东槎闻见录》。

2. 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1901—1906 年留学生人数达 12909 人）学习和研究日本的先进技术、先进思想 涌现出一大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军事人才。与此同时，大批中国学者、爱国志士纷纷赴日参观访问，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寻求中国富强之道。他们回国后 撰写文章、游记 介绍日本 宣传日本走向近代化的经验，以此推动中国的改革与维新。这些人当中出现了不少研究日本的学者、专家，他们的著作造诣较高，影响较大。

上述人员撰写的游记、著作主要有 王韬的《扶桑游记》、王之春的《谈瀛录》、李筱圃的《日本纪游》和《日本杂记》、傅云龙的

《游历日本图经》和《游历日本图经余记》、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叶庆颐的《策鳌杂摭》、吴庆澄的《东游日记》、刘学洵的《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罗振玉的《扶桑两月记》、黄琼的《游历日本考察农业日记》、吴汝纶的《东游丛录》、张謇的《东游日记》、程清的《丙午日本游记》、盛宣怀的《愚斋东游日记》、程恩培的《日本变法次第类考》、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等。

清代（主要是后期）的中国日本研究的特点是：

1. 与历代一样，清朝于乾隆四年（1739）在官撰的《明史》中也设了《日本传》。该传篇幅较大，内容丰富，主要记述明朝与日本的关系，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是，清代有关日本研究的著作主要出自民间，民间的研究已占据主导地位，官撰制度已处于次要地位。可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它使中国的日本研究彻底从官方走向民间，使从事日本研究的人员具有相当的广泛性。

2. 日本研究的成果趋向多样化，除一般性著作、专著外，还有游记、诗集等。

3. 从研究方式上，彻底改变了以往的隔海研究日本的方式，有关日本研究的专著、游记等，大多是在实地调查，大量搜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从而为研究成果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4. 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有关日本研究的著作，一是研究领域尽管多限于国事交往、商贸、民间交流等，但从下述几部著作涉及的课题来看，其研究范围已有所扩大。王韬的《扶桑游记》的内容包括人文风貌、山河、文艺、古迹。叶庆颐的《策鳌杂摭》的内容有国名、世系纪年、疆域、徭赋、官制、俸给、军舰、山川、季节、名胜。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涉及的领域有日本神话、历

史、政治、地理、民情、教育、文化、宗教、服饰、医术、商业、技术、鸟兽等。程恩培的《日本变法次第类考》共分 25 类 主要有宪法、法院、民法、商法、刑法、官刑、官规、统计报告、外交、地方制度、土地、警察、出版、监狱、卫生、家教、财政、军事、教育、劝业、矿业、设计、运输、邮政等。二是 研究质量上 ,一些著作中对某些领域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这方面突出的代表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该书由 1 表(中日对照年表)、12 志组成。12 志包括 国统志(记述日本历史) 邻交志(中日关系史等) 天文志(历法史) 地理志(各藩地理状况) 职官志(政府构成、官吏等级、薪俸等) 食货志(户籍租税、财政、国债、货币等) 兵制(陆海军状况等) 刑法志(1881 年颁布的治罪法和刑法) 学术志(汉学、洋学、文字、学制) 礼俗志(祭典、婚礼、葬式、服饰、饮食、乐舞、佛教、氏族、社会) 物产志(物产与贸易) 工艺志(医药、农事、织工、刀剑、漆器等工艺技术的发展状况)。该书是这一时期中国日本研究中水平最高、最有影响的著作,是这一时期中国人研究日本的代表作。^①

5.从研究的出发点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这就是,外为中用 结合中国实际,了解日本 研究日本 学习日本 以推进中国的近代化。例如 前述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重点是详细介绍明治维新,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有启发性的评论。这部分在后来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再如,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 全书 20 卷,12 册,记述了明治元年(1868)至明治 23 年(1890)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重点记述明治维新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并逐条加了按语,说明其利弊以及中国应该怎样模仿。这些按语成了这部著作的精华,也集中体现了作者研究日本明

^① 前引《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第 116、129、133-138、141-143、147 页。

治维新决不是一般的学术研究，而是与当时中国的改革实践密切相结合而进行的。据说在后来的‘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颁布的诏书不少直接引用了该书中按语，或者是从按语中获得启示后写成的。^①

四、中华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

从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只有 30 余年但是，中国的日本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现分述如下。

第一阶段从 1912 年至 1930 年。即从民国建立至“九一八”事变之前。这一阶段日本研究总的来看成果不多水平一般。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是中国人的日本观发生根本转变的时期。如前所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中国出现了了解与研究日本的高潮，大批人员赴日访问或留学，报刊舆论大量介绍日本政治社会改革和风土人情。这时人们关心的是研究和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以推进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现代化的进程。

但是，中国人民目睹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后来日本表面上佯装支持孙中山革命派，实际上暗中勾结北洋军阀、扶植各种亲日势力，制造矛盾、挑起事端，反对中国革命的现实。特别是 1915 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面目公开暴露，此时，人们从向往明治维新的美梦中惊醒过来，重新认识了日本，开始识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本来面目，中国人的日本观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样，1915 年以后，特别是进入 20 年代，中国的日本研究的重点

^① 前引《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第 145—146 页。

与方向都起了重大变化，即从过去的客观地介绍日本，宣传和赞扬明治维新及日本的近代改革，逐渐转向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揭露和批判其本质。

这一阶段，中国的日本研究的特点是：

1. 与人们渴望更深入了解日本的要求相适应，日语著作的中译本（译著）和日本游记大量出版。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统计，1911—1931 年间，中国出版的译著 665 种（每年平均约 32 种）日本游记 50 种。^①

2. 研究的重点十分明确，即研究日本为什么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侵略中国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著作相继出版如《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侯培兰，1913）、《日本侵略满蒙史》（支恒贵 1927）、《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李士刚，1928）、《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蒋坚忍，1931）、《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三省》（许兴凯，1930）等。

3. 研究领域有所扩大，研究水平也有所提高。除一般研究外出版了一些专门史和专题研究著作如《中日国际史》（史俊民，1919）、《中日外交史》（吴敬恒，1928）、《中日外交史》（陈博文，1929）、《日本社会史》（徐孔僧，1931）、《日本文学史》（谢六逸，1929）、《日本论》（戴季陶，1928）、《日本无产政党研究》（施存统，1929）、《日本关税制度》（周培兰，1928）等。就学术水平而言以戴季陶的《日本论》为最高。该书 24 章，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社会、文化、思想及日本对外关系等内容广泛而充实，论述精辟，尤其对明治维新发生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日本国民性的分析，与众不同，见解独特。该书是继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之后中国日本研究的又一部可传之作。

^① 前引《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第 179 页。

第二阶段,1931至1945年即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年至日本帝国主义崩溃。这一阶段,中日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在抗日高潮中,全国上下都关注日本的动向,各界人士从不同角度开展对日本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大量增加,内容丰富,水平也大有提高,有的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日本研究的第三次高潮。

促成这一时期日本研究迅速发展的原因,一是如前所述,自1915年以后,中国人的日本观发生重大变化,对日本的认识有了一次飞跃,从而为这一阶段深入研究日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速推进先“满蒙”后华北最后征服全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扩张的世界战略,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继而于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为形势所迫,中国人不得不加紧对日本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知己知彼”,制定正确的战略和对策,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这一阶段,中国的日本研究的特点是:

1. 研究成果数量多,内容丰富。据笔者依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1931—1945年出版的有关中日关系史、历史、经济、教育、文学艺术、语言、政治制度等领域研究的著作有920种,其中有关日本史研究的著作有247种。按类别区分如下:日本综论31种,日本通史、概述22种,近代史概述19种,战时日本概述94种,法西斯化13种,战时日本外交30种,日美关系及太平洋战争15种;日本人民反战活动4种。

2. 日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与群众性,这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是30年代以后,日本研究冲破少数人进行研究的局限性,逐渐走向社会,成为大家共同关心,共同进行的工作。研究

队伍从少数专业人员扩大到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士。

二是日本研究丛书的大量涌现。据统计，30年代全国出版的各类日本研究丛书共50多套。其中，南京日本评论社出版的《日本研究会小丛书》“每周一种 每种论述一个问题”以此“暴露近代日本的破绽，务使其真相毕露，燃照无遗”（“日本研究会小丛书”的“编辑旨趣”）该套丛书共出版83种 其中 有关日本经济的25种（占30.1%）、政治与政党的5种（占6%）、社会运动的7种（占8.4%）、文化教育的8种（占9.6%）、军事的12种（占14.5%）、国际关系的10种（占12.1%）、中日关系的9种（占10.9%）、其他7种（占8.4%）。这套丛书规模最大，内容最充实。其他丛书，如“反日帝国主义丛书”（昆仑书店出版，12册）、“日本国情研究丛书”、“日本知识丛书”等 各成体系 涉及日本研究的各个领域。大量丛书的出版，表明中国的日本研究已突破了孤立的、一人一书的方式 出现了按领域、按系列 多人共出一套书的方式。这种协作研究的形式，反映了日本研究的广泛性，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时期日本研究的开展。

三是日本研究杂志的大量增加。据统计，三四十年代，全国发行的有关日本研究杂志多达23种 主要有《日本研究》、《日本》、《日本评论》、《战时日本》、《日文与日语》、《日本论坛》等 这些杂志半数以上是月刊或半月刊，发行量较大，而且多在上海、南京、广州、重庆等大中城市 拥有广泛的读者 影响很大。^①

3. 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研究重点更加突出。辛亥革命以后 特别进入30年代，日本研究的领域已从以往的国事交往、

林旭：《中国日本研究杂志沿革初探》，载《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历史回顾与展望》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6-9页。

商贸、民间交流等扩展到哲学、历史、经济、法律、文学、语言、艺术等领域，而随着日本研究的发展，新的领域不断被开拓出来，例如（人口学 社科类）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金融、银行、交通运输（经济类）图书出版（文化类）教育学、各类教育（教育类）文学评论、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戏剧、绘画（文学艺术类）。

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不断扩大，日本研究的重点更加突出，这就是，研究日本的政治、军事、中日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法西斯化、军国主义、武士道、大和魂等。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当时昆仑书店出版的“反日帝国主义丛书”的序言，做了最明确的说明。该丛书“序言”称：“打倒日帝国主义是一长期的工作，是全中国民族共有的责任，但不彻底认清日帝国主义是不能获得打倒日帝国主义的正确路线与手段的。本书店有鉴于此，特请对于日本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站在严格的科学立场，指示出日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状况及其侵略中国简史与一般的国际形势，分成十二册，每册专门研究一个重大问题，但各个问题又均有极深切的联系，全装起来即为一大本反日专书，真是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必读的著作。”

4. 出现了一些水平较高的著作，这些著作，有批判和揭露日本神国思想的如《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性》（姚宝猷，1944）；有批判日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如《日本与法西斯主义》（傅无退，1933）、《日本主义批判》（李毓田，1938）；有研究日本民族性并就中日民族性进行比较的，如《中日民族论》（缪凤林，1928）、《日本民族性》（陈德征，1928）、《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日本研究》（蒋百里，1939）；有分析研究日本政治状况的，如《日本政治经济研究》（许兴凯）、《日本的军部、财阀、政党》（郑学稼），这些著作有的已达相当的深度，以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

的日本研究》为例。该书先从日本的自然、地理、风土和人种特性入手，继而又对日本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众多代表性人物的经历进行分析比较，从中得出结论：日本人目光短小，性情暴躁，且变化无常，悲观、宿命并经常充满矛盾（指心理和个性的两重性）。40年代，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写成的《菊花与刀》中有关日本人双重性格的论述最为深刻和精辟，但这一观点与蒋百里的分析几乎是同出一辙，可蒋之所见则早于美国人七八年。可见这些研究日本的著作水平之高。^①

第三阶段从1945年至1948年，即从日本帝国主义崩溃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在这短暂的时期内，由于当时的国内外条件的限制，难于开展系统的研究，只有一些著名学者和专家，围绕日本战后处理及日本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等问题发表文章，并撰写了一些介绍战后日本情况的著作，如《战后日本秘闻录》（谭若水，1946）、《战后日本问题》（思慕，1948）、《战后日本与盟国》（中华学艺社，1947）、《建设新日本的关键》（改造日报馆，1946）等。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日本研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中国的日本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日本研究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直到80年代以后，才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日本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1949—1978年；第二时期，1979年至今。现分述

^① 前引《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第222—224页。